

“强关系网”与退休老年人口的再就业

张 翼 李江英

【提要】 本文认为,中国的老年退休人员,具有较为强烈的再就业冲动。其再就业的目的在于增加收入;其再就业求职的主要路径是依赖强关系网——亲戚、亲属、朋友关系。国家成立的各级老年组织,基本上对老年退休人员的再就业,未起帮助作用。

【作者】 张 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江英 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 从强关系网络获得就业支持的假设

费孝通先生曾经以“差序格局”来形容个人以家庭为中心所组建的关系网络。在网络最中心的是个人,在个人周围的是家庭成员,再往外波及就是家族成员与外戚,继之层层往外推开,就是朋友群体和社会大众(费孝通,1998)。这种以亲戚亲属为中轴,再以朋友关系为单元构建的网络,实际就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1998)。这是一种随时可以使用的资源。网络越大,网络之中各个单元结构之上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信息供应越足,那么,在这一网络之中的其他个体就籍此可获得的帮助越大。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也曾经以结构分析的方法,对社会之中的权力与交换作过翔实的论述。他在《不平等与异质性》(Blau,1964)一书中,对宏观社会结构中个人的交往特征作过深刻的分析。在他的宏观社会理论的四个假设之中,就有三个假设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交际网络对个人的资源性贡献。其接近性假设指出:社会地位接近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多于社会地位差距过大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其机会性假设指出:人们之间的交往程度和关系密切程度取决于他们发生接触的机会——这个假设是非常明晰的,即人们永远不能与自己无法接触的人交朋友;其促进性假设指出:人们同其他社会群体或集团的交往会促使自己向这些集团或群体流动^①。布劳的研究说明,网络结构对个人的社会流动,尤其是基于职业的社会流动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布劳的研究没有直接切入亲属关系结构中,但却在结构层次上,分析了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个体之间易于交往的本质特点,这对于我们认识职工在职时的社会地位对他们退休之后再就业时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地位的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格兰诺维特凭借个人之间交往时间的长短、交往过程的情感投入程度、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和互动的频繁程度研究并区别了人们在关系网络结构之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Gronovetter, Mark, 1973)。凡是经过长期的交往而建立的,构建在直接的、面对面的情感交往基础上的

^① 布劳的第四个假设是“独立性假设”,该假设认为社会结构中任何一种社会地位对人们社会交往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其他社会地位的影响。

互动频繁而又具有相互间资源交换关系的亲密关系,就是强关系,反之,就是弱关系^①。如果将格兰诺维特的观点与费孝通的观点相比,那么,其强关系类似于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轴心结构^②,弱关系类似于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边缘结构;如果将格兰诺维特的观点与布劳的宏观结构理论相比较,那么,格兰诺维特的强关系类似于布劳的同质性结构,弱关系类似于布劳的异质性结构^③。

格兰诺维特基于以上的认识,得出的结论是,在人们找工作的过程中,弱关系提供的信息帮助要比强关系提供的信息帮助更多更大。因为弱关系是在布劳所说的“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由弱关系提供的信息,往往比基于“同质性”而建立的强关系所提供的信息要更加有用一些。

在格兰诺维特对“弱关系的强度”作出论证之后,林南在网络研究中,又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他认为,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Lin Nan, 1990)。即社会网络所带来的资源,虽然并不为个人所占有,但却能够通过个人所具有的社会关系而“流通”到个人手中。

边燕杰(1998)在天津市的一项调查表明,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的强度”,并不在所有社会都起作用。他认为,在中国,人们的求职渠道往往是通过个人所建立的中心网络结构构筑起来的——即人们主要是通过强关系而找到工作的,因为处于强关系结构之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④。张文宏和阮丹青在对“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中,发现亲属和朋友对城乡居民的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都很重要(张文宏、阮丹青, 1999)。而张其仔对晋江的调查也发现,强关系在人们的投资过程中,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张其仔, 1999)。

华人研究者的一系列调查发现,在中国社会网络之中,社会资源的利用及其在社会网络之中的流动,与亲戚亲属及朋友所构建的网络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老年退休人员是怎样获得自己再就业职位的呢?换一个更有社会学意义的表述来提问:老年退休人员是依靠了弱关系链条之上人员的帮助而找到工作的,还是依靠了强关系链条之上人员的帮助而找到工作的呢?

倘若把工作机会作为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来看待,那么,知晓某种就业信息或者掌握某种就业机会的理性经济人,就会把这个就业信息或就业机会更多地提供给自己关系密切的人,而不会提供给自己漠不关心的人。现在中国的就业市场,是供给超过需求而不是需求大于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老年欲就业者所遇到的就业竞争,就不仅来自于与其境况相类似的老年退休人员,而且还主要来自于年轻下岗人员。这时候,一个社会个体所具有的亲戚亲属关系结构、或者其所具有的与其他社会个体所铸造的朋友关系网络,就会对其是否能够取得某个就业机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一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被资源占有

① 格兰诺维特是从4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的:一是互动的频率,互动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为弱关系;二是情感的强弱,感情强则为强关系,反之为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交换,交换多则为强关系,交换少则为弱关系。格兰诺维特立论的基础是“弱关系具有信息桥的作用”。

② 费孝通没有明确地使用过“轴心结构”这一名词。这是笔者对其“差序格局”理论的总结。笔者认为其构造的网络理论所涉及的最靠近自己的那些人——家庭成员与亲戚朋友,应该是其“轴心结构”的部分。

③ 当然,这里对布劳与格兰诺维特的简单性比较,有着很大的危险性。但依据布劳的接近性假设,人们铸造的强关系,自然与人们交往的同质性有着极其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可是,在现实生活之中,也不排除异质性社会成员交往的“强关系”性。像富人与其穷亲戚之间的关系,就很有可能发展为强关系,也有可能发展为弱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却是先赋性的,是不能被轻易消除的。

④ 关于人们在求职过程中主要是依靠了强关系还是弱关系而找到工作的讨论,在格兰诺维特1993年的文章发表之后,曾经掀起过一场争论。应该说,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定论。

者享用的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资本(Bourdieu,1997)。由此看来,退休职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其家庭关系网络和朋友关系网络所形成的关系资本,也就可能会转变为“就业机会”这种能够带来工作收入的岗位资本。因而,强关系网络以及个人利用强关系网络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就成为退休职工再就业职位获得的重要根据。

下面,笔者主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老年人再就业研究”课题组在1997年6月对山东省泰安市与江苏省无锡市两地所作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老年人构建的关系网络对他们再就业机会的影响(张翼,1999)。

2. 再就业压力与退休人员对强关系网络的依赖

90年代以来退休的人员,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人员。他们在职工作的绝大多数年代,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家以低工资、高积累的方式,将本应作为个人收入的养老金全部作为利润上缴,而实行着现收现付式的企业退休金支付方法。这种养老方式,在退休人员较少、在职人员较多的前提下,有利于国家重积累轻消费政策的实施,但在退休人员逐渐增多,在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就难以“以新养老”。1990年以来,中国对这种现收现付式的养老政策进行了改革,将原来单一的现收现付式企业养老办法逐步改变为统账结合式的养老金支付办法。1998年,国家又在原来的市级统筹的基础上,实行了省级统筹——提高了统筹层次。这种办法注重社会公平,注重以新建立的企业去减轻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过多的压力,还力图通过对非国有经济单位在职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的征收,来补充国有经济各单位退休金的不足,从而使统筹之后某一地区退休人员所获得的养老金基本差异不大,并保证离退休人员能够如期领取退休金收入。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再就业退休职工的身体状况各不相同,但他们再就业的主要动机却都是“增加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退休职工的求职心态,就有着某种“非自主性”,即不是自己去寻找自己所喜欢的工作,而是工作机会选择着他们再就业的职业方向和职业地位。我们在山东省泰安市和江苏省无锡市两地的调查发现:老年再就业职工只有30.5%的人从事着与其原来职业相同的工作,而有69.5%的职工却从事着与其原来职业不相同的工作。要在其所从事的与其原来工作不相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专长”,那是极其艰难的。这只能说明,退休职工的再就业,是补充家计生活的再就业。只要有工作可干,就不惜放弃自己原来的专长,而去从事简单劳动。

在就业市场压力极其巨大的前提下退休人员的再就业机会,实际是比较难以“寻找”的。除

表1 身体健康状况与职工再就业目的的交互表

	增加收入	精神寄托	工作需要	发挥专长	其他	行总计
无病身体好	218 57.5	84 22.2	25 6.6	42 11.1	10 2.6	379 60.0
无病体质差	12 63.2	5 26.3	— —	2 10.5	— —	19 3.0
有病行动方便	118 52.4	58 25.8	17 7.6	27 12.0	5 2.2	225 35.6
有病行动不便	6 66.7	1 11.1	2 22.2	— —	— —	9 1.4
列总计	354 56.0	148 23.4	44 7.0	71 11.2	15 2.4	632 100.0

注:表中各项的第一行为频数,第二行为在该项中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老年人再就业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

非退休职工以低工资和长工作时间作为先决条件(见表 2)。于是,就业机会就成为稀缺资源。依靠自己早已织就的社会网络与强关系资本,去寻求工作机会,也就成为老年人再就业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依赖因素。

3. “强关系”网络对退休人员再就业的影响

按照布劳的接近性假设,“人们总是选择与自己社会地位相似的人交往”,由此可以推知,一般工人交往的朋友,大多应该是一般工人;技术人员交往的朋友,大多应该是技术人员;而干部的交往对象,也就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层次之上。这样,由于一般工人在职工作时的社会活动范围,受到其社会地位的限制,参与企业之外市场交换的能力,就会受到企业界限的限制。再加上受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单位制”的影响,一个企业的职工及其家属,基本上都被安置在该企业内部工作和生活。无论是工作地点,还是家庭住所,都由企业统一安排在同一社区。这样,职工与外界社会的交往,就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些依据先赋性亲属关系作纽带^①、或者依据业缘朋友群体和趣缘朋友群体而形成的交往圈,就成了人们交往互动的链条。没有这条链条的连接,其社会关系网络就很难比较稳定地延伸进社会之中。事实上,普通职工的初级群体^②,只能依靠亲戚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而建立。而他们的朋友,却由于布劳所说的交往机会的限制,被局限在企业之内。这样一来,在其退休之后,想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的希望,除了依靠自己的努力之外,就只好依靠企业社区之内亲戚亲属或朋友的帮助。

从表 3 所示的频次分布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被调查的退休职工中,绝大多数是依靠“自己”或“亲属亲戚朋友的介绍”找到工作的(占 75.2%)。由于“原单位工作需要”而被反聘的人员只占 14.9%。如果将这部分人排除在外,那么,我们会发现:职业介绍所和老年组织在退休人员的再就业当中,没有起多少作用。所以,对于地级市来说,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所帮助的因素,不是国家的正式组织,而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和途径,更准确地说,老年人自己具有的亲属亲戚朋友等所缔结的强关系网络,才真正帮助他们找到了工作。

所以,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强关系在退休职工找工作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在中国,就业信息,不仅仅意味着对某一职位空缺消息的知晓,也不仅仅意味着某一岗位对工作人员的迫切需求,还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因人设位。目前,国有企业仍有大量冗员;在集体企业中,也存在着人浮于事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就业信息的传递就与就业机会的配置结合在一起。只要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

表 2 退休职工的再就业次数与月工资和周工作时间

	月均工资 (元)	周均工作时 间(小时)
就业一次仍然就业者	308.93	53.99
就业一次停止就业时	229.33	49.90
就业二次仍然就业者	275.61	56.61
就业二次停止就业时	205.68	44.82

资料来源:同表 1。

表 3 再就业退休人员获得工作途径的频次分布

	频次	所占百分比
自己找	240	38.0
亲属亲戚朋友介绍	235	37.2
职业介绍所介绍	5	0.8
老年组织帮助	14	2.2
原单位工作需要	94	14.9
其他	44	7.0
总计	632	100.0

资料来源:同表 1。

① 当然,在对于企业外社会资源的利用上,同学与朋友等社会资源,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在笔者对吉林省长春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的实际调查中,发现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要依赖路径,还是亲戚亲属。

②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库利(Cooley, Charles Horton)提出和使用的一个社会学学术语。其本意是指能够发生面对面的交往关系的,以情感为联系纽带并且经常性的互动的社会群体。

中能够发现配置就业机会的权力资源,那么,对这种权力资源的利用,就成为老年欲再就业者及其亲戚亲属朋友的首要选择,而社会网络正好提供了传递各种社会资源的便捷通道。于是,将人情资本、或亲戚亲属这些特殊的亲缘和姻缘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本,然后再将权力资本用来配置就业机会,就成为现今沉重就业压力之下老年劳动者既可以获得劳动岗位,而又耗费较小交易成本的优选方案。

权力资源与岗位供给的相关性,是中国老年人能否在一个组织机构获得再就业机会的重要前提。边燕杰(1998)曾经将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就业信息与就业岗位的最终作用作了明确的区别。就业信息的传播和获取,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就业岗位。就业信息的获得者是众多的。但一旦社会关系网络参与其中,最终对岗位资源的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则可能正是网络本身,而不是网络之外劳动能力的竞争。对于老年人来说,再就业岗位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不是很强。这些职业,也都是那些技术含量非常低的辅助性职业。对于绝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只要劳动态度正确,他们都能够顺利完成这些劳动岗位所要求的工作量。因而,在老年人大多具有再就业冲动的前提下,借助于强关系而获得劳动岗位的可能性,就远远大于弱关系。

当然,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所提供的就业信息也是极其重要的。由于网络之外的人员的异质性(不相似性),其所提供的信息,也就具有某种异质性——可能正好是网络之内人员所稀缺的信息。但老年人再就业的职业选择和就业地点选择,是受了极其强烈的区域限制的。一般老年人不可能离开其居家城市而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再就业,这是由其年龄、体质以及其对家庭的强烈依赖等因素所决定。就是在其退休的城市,其由于体力的影响,也不可能到距离其家庭很远的地方去工作。所以,弱关系所起的信息提供作用,就被极大地限制了。

从表4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退休职工中,绝大多数“自己找到工作”的再就业者,都是退休之后的“个体户”。只有那些退休前是“干部”的再就业者,才有近23.1%的人获得了“门卫”的岗位。这就是说,“门卫”这样既轻省而又有收入保障的劳动岗位,并不是一般职工所能够轻易获得的。所以,除“干部”之外的退休前其他各职业类型人员,有66%以上当了“个体户”。因为“个体户”花费的交易成本可能最小,只要筹集到一部分资金,无需更多地拉关系,就可以开业而自食其力。正因如此,在自谋职业者中间,有70%的人作了个体户。而退休前为商业人员的,则100%的作了个体户。这说明,这些再就业者没有更多地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去取得工作岗位。

老年退休人员依赖于亲戚亲属朋友介绍找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与亲戚亲属朋友之间的信任关系较好(杨宜音,1999)。越是对自己的亲戚亲属和朋友信任,就越企望这些信任者为自己找工作。从表5可以看出,经过亲戚亲属朋友的介绍而再就业的老年退休人员的岗位分布,远不如“自己找工作者”那样集中分布在个体户上。

与自己找工作者不同的是,经亲戚亲属朋友介绍而再就业的退休人员所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门卫”上。除了“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办事人员”外,原从事“商业工作者”、“服务性人员”、“农林牧副渔劳动者”、“生产工人和运输工人”等地位较低的职业劳动者,在退休之后再就业者,集中在“门卫”这一职业之上的比例,都在40%以上,其占总样本的比重也达到了34.4%。从事“街道工作”者所占总样本的比重为18.8%,也高于“个体户”的13.8%。

为什么经过亲戚亲属和朋友介绍而再就业者的职业选择会主要集中在“门卫”和“街道工作”两个职业类别之上呢?因为,当“个体户”要参与市场的竞争,需花费更多的劳动时间去经营,若经营不善,自己要承担亏损,这是一种风险性较强的职业。而“门卫”与“街道工作”则是相对稳定的工作。只要每天按时去上班,就能获得一份收入。而且,这种工作不用消耗更多的体力和脑力,也不用为自己的劳动报酬操心。只要依据自己受雇的组织机构的规章制度去办事,就可以领取工资。所以,这是风险性较低或干脆不具有风险性的职业。如果介绍自己到该单位

表4 自己找到工作者原从事职业与再就业从事职业的情况

再就业职业	门卫	街道工作	个体经营者	专业技术人员	行政管理工作	一般工人	其他	行总计
原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	2	20	4	—	1	3	30
	—	6.67	66.67	13.33	—	3.33	10.0	100
机关有行政级别干部	3	1	6	2	—	—	1	13
	23.08	7.69	46.15	15.38	—	—	7.69	100
机关办事员	1	1	11	—	2	1	—	16
	6.25	6.25	68.75	—	12.5	6.25	—	100
商业工作人员	—	—	8	—	—	—	—	8
	—	—	100.00	—	—	—	—	100
服务业人员	1	—	18	—	1	—	—	20
	5.00	—	90.00	—	5.00	—	—	100
农林牧副渔业人员	—	—	5	—	—	—	1	6
	—	—	83.33	—	—	—	16.67	100
生产运输工人	6	8	66	1	—	8	11	100
	6.00	8.00	66.00	1.00	—	8.00	11.00	100
其他人员	1	—	11	—	—	1	1	14
	7.14	—	78.57	—	—	7.14	7.14	100
列总计	12	12	145	7	3	11	17	207
	5.80	5.80	70.05	3.38	1.45	5.31	8.21	100

注：表中的第一行为频次，第二行为该项的百分比。涉及样本 207 个。

资料来源：同表 1。

表5 经亲戚朋友介绍而再就业者的原职业与再就业职业对比

再就业职业	门卫	街道工作	个体经营者	专业技术人员	行政管理工作	一般工人	其他	行总计
原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8	9	4	1	3	4	3	32
	25.00	28.13	12.50	3.13	9.38	12.50	9.38	100
机关有行政级别干部	4	2	4	2	2	2	—	16
	25.00	12.50	25.00	12.50	12.50	12.50	—	100
机关办事员	1	1	1	4	2	2	3	14
	7.14	7.14	7.14	28.57	14.29	14.29	21.43	100
商业工作人员	4	3	1	—	—	1	—	9
	44.44	33.33	11.11	—	—	11.11	—	100
服务业人员	6	—	2	—	—	1	2	11
	54.55	—	18.18	—	—	9.09	18.18	100
农林牧副渔业人员	2	—	1	—	—	—	1	4
	50.00	—	25.00	—	—	—	25.00	100
生产运输工人	28	13	6	5	4	7	4	67
	41.80	19.40	8.96	7.46	5.97	10.45	5.97	100
其他人员	2	2	3	—	—	—	—	7
	28.57	28.57	42.86	—	—	—	—	100
列总计	55	30	22	12	11	17	13	160
	34.38	18.75	13.75	7.50	6.88	10.63	8.13	100

注：表中的第一行为频次，第二行为该项的百分比。涉及有效样本 160 个。

资料来源：同表 1。

工作的亲戚亲属或朋友也在该单位工作，或者这个介绍者是该单位的“领导”的话，那么，这些占据了“门卫”和“街道工作”之岗位的再就业者，还可以获得这些“有权人物”的照顾，不仅工资收入会较高，而且还可能得到大家的尊重。这大概是老年再就业者所企望的比较好的就业环境。

总之,越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老年退休人员,其亲戚亲属或朋友的社会地位也就较高,其所依赖的强关系网络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也越丰富,为其在退休之后找工作所提供的帮助也就越大。越是没有文化的老年退休人员,就越是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缺少权力资源,也就越难以依靠自己的强关系找到工作,他们只好自谋职业。可见,由“亲戚亲属朋友”所组织的强关系,不仅对退休职工的再就业起了影响作用,而且还对他们的就业途径和职业选择,起了再配置作用。

4. 结论

4.1 在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大转型时期,对老年人再就业提供了主要帮助的是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也就是说,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的中轴,或者为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强关系——由家庭或家族关系所形成的亲属亲戚结构和朋友结构,为老年人的再就业和再就业时的职业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这也证明了布劳的接近性假设、机会性假设和促进性假设,还与边燕杰在天津和广西地区关于求职调查中所得出的“强关系”结论一致。

4.2 国家所组建的正式组织——职业介绍所和老年组织,对老年人的再就业,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这种正式社会组织的功能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年再就业者依靠强关系网络去找工作的行为,起了某种促进作用。

4.3 在原工作单位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员,其社会关系网络越是接近权力资源,其亲朋的社会地位也有可能较高,其就比较容易依靠自己的“亲戚亲属朋友”关系网络去找到收入较为稳定的工作。越是在原工作单位社会地位较低的退休人员,其社会关系网络就有可能远离权力资源,其亲朋的社会地位也许就较低,其从正式的社会组织之中获得工作岗位的机会就越少,其越是易于去从事“个体户”的职业。

4.4 那些文化程度较高而又技术能力较强的人员,较一般工人更易于为原工作单位所反聘,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也遵循着此种趋向,但工人被反聘的可能性极低。

参 考 文 献

1. Gro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2. Gronovetter, Mark (1974), *Getting a Job*,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Lin Nan, 1990,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structure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pp. 247~271, edited by Ronald Breig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Blau, Peter.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John Wiley & Sons Inc.
5. 布劳:《不平等与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6. 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
7. 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5期。
8.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9. 张翼:《受教育水平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4期。
10. 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1. 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2. 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3. 张其仔:《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4. 费孝通:《差序格局》,载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30页。
15. 胡晓义:《1998~1999年:中国社会保险状况及其改革》,载于汝信等主编:《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2~153页。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